

资政要览

下

社会卷

主编 赵禄祥 赖长扬

社会包罗万象，是一切事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没有

社会的安定，就没有

社会的发展；而没有

社会的保障，就没有

社会的安定。『民

为邦本，本固邦

宁』。安定社会

的前提在于了

解社会，顺应

民心，促进发

展，这是为

历史经验所

证实了的。

『社会卷』是将中国社会史以及相关课题作为史学对象的首次尝试。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阶级与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乃至各种社会问题，都是『社会卷』所着力探讨的课题。

领导干部读史

中国档案出版社

资政要览 下

社会卷

主编 赵禄祥 赖长扬

中国档案出版社

目录

下 册

道君皇帝与宋代的道教崇奉	(407)
积弱与奢靡并存的南宋畸形社会	(425)
辽夏金乱世与宗教迷信的盛行	(441)
元代伦理道德与社会禁约	(449)
明代的流民与社会动荡	(469)
明代的流民与城镇	(487)
商品与明代社会	(508)
明代的商人与商帮	(525)
明代的通海者	(546)
畸形的明代宫廷社会	(569)
晚明社会的纵欲思潮	(601)
妓女与晚明士大夫	(619)
明清的蠹吏	(636)
人口大国与清代人口问题	(683)

清代的皇商与官商	(701)
清代婚姻关系透视	(713)
清代八旗子弟	(726)
清代的吸毒与禁毒	(746)
流人与清代的流人社会	(777)

道君皇帝与宋代道教崇奉

大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正月乙卯，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出现了颇引人瞩目的一幕。这一天，自命为道君皇帝的宋徽宗手诏：“应寺院屋宇、田产常住，一切如旧，永不改革。其服饰、其名称、其礼、其言，并改从中国，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称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同一天，又降御笔称：“僧已降诏为德士，所有僧录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篆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隶属道德院，蔡攸通行提举。天下州府僧正司可并为德士司。”^①同年五月，宋徽宗又降御笔，对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



宋徽宗

说明，并有所发展。中称：“手诏释氏改服，异名并从华俗，不废其教，翕然成风。然习之者，不知道妙，未称一道德、同风俗之意。今后应德士并许人道学，依道士法。其德士宫观知副以上职掌有阙，非试中人不在选举差补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39，宣和元年正月乙卯。

之限。其德童（原行者）遇试经拨放，并习《混元道德》或《灵宝度人》一经。庶人无殊习，道通为一，以副劝奖之盛。”^①这样一来，僧徒不仅要改换服装、名称，而且要学习道教经典，通道经之义。无怪乎宋人邵博慨叹：“北齐敕道士为沙门，宣和敕沙门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②

尽管改僧为道这一闹剧持续时间不长，但它体现了宋代宗教崇奉的主流，亦即在其并隆三教政策中更重道教的倾向性。追根寻源，这一倾向性的出现还要从宋太宗说起。

一、宋太宗缘结道教

宋太宗赵匡义的上台，给历史留下了“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其中真情如何，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毫无疑问，对于他的继位，道教是帮了大忙的。

据宋人释文莹《续湘山野录》载，宋太祖在未登皇位时，曾与一个自称“混沌”、又称“真无”的道士一起游历。开宝八年（975），太祖驾幸西沼，遇此道士，请问自己的寿限，道士回答：“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于是，“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人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于枢前即位。”宋太祖在二十日夜的突然去世，是道士的预言真的灵验呢，还是偶然的巧合，抑或是有其阴谋，仅凭这一条材料，无法于此三者中作出明确的判断和选择。应当注意的是这一事实：道士预言了太祖可能要在二十日夜死，则太祖果于是夕死，太宗则于是夕继位。我们来看下面的材料，是否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初，有神降于整屋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

① 《拾补》卷39，宣和元年五月丁巳。

② 《闻见后录》卷29。

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篆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避席，若有所逊谢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①

国初，有神降于凤翔府整屋县民张守真家……守真遂为道士。开宝九年，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降神，神有晋王有仁心等语。明日，太祖晏驾，晋王即位，是谓太宗。诏筑上清太平宫于终南山下，封神为翊圣将军。^②

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寻召守真作延祚保生坛。醮罢，真君降言于内臣王继恩曰：“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诛身。赏罚行之既平等，天无纷秽地无尘，爱民治国胜前代，万年基业永长新”。继恩录之以闻。太宗览之惊异，顿首谢曰：“家国之幸，宗庙之幸。”……寻遣内侍供奉官王守节、起居舍人王龟从，就终南山下筑宫……凡二年，宫成。^③

太宗同午夜秘殿底诚稽首再拜谢曰：“仰赖上真，福浸生灵，誓当修奉。”……及赐（守真）县官邸店越数百楹。^④

诏封太平宫神为翊圣将军，从道士张守真之请也。^⑤

从以上几条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此神预言了太祖将死，将由太宗继位，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第二，太祖对那个能独辩神言的张守真是有所怀疑和不太信任的；而张守真与太宗的关系则是十分密切的。第三，从太宗的自叙中也可看出，此神对他的继位是帮了大忙的。也正是为此，宋太宗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壬子。

② 《闻见后录》卷1。

③ 《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④ 《金石萃编》卷134，《圣宋传应大法师行状》。

⑤ 《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十月壬戌。

为崇奉此神，又建宫殿，又加封号。而对于神的代言者张守真，也不惜赐予大量的邸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太祖之死，很大程度上是太宗与道士们合伙搞了一场阴谋，从而促成了宋太宗的上台。当然，太宗的宫廷政变不只是靠与道士的合谋，但无疑的是，道士们的活动是其宫廷政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促成了其整个阴谋的实现。

正是因为太宗采取这种阴谋手段取得了皇位，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说明其继位的合法性，为了安抚人心，宋太宗就要找一个很好的借口，作一番让人信服的解释。这种借口，就是所谓的天意、神的安排。据《宋史·太宗纪》载：“太宗……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宪皇后杜氏。初，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官舍。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作为应命之主的宋太宗，其生也异于常人。他长成之后，又有道士预言其日后要当皇帝。史载：“祖宗居潜日，与赵韩王游长安市。时陈抟乘一驴遇之，下驴大笑，巾簪几坠。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从市炊乎？’太宗曰：‘与赵学究三人并游，可当同之？’陈睥睨韩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得预此席。’既入酒舍，韩王足疲，偶坐席左，陈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辄居上次，不可。’斥之使居席右。”^①也就是说，太宗的皇位，是上天注定的，太祖死后，按照上天的安排，由太宗继位是理所当然的。显然，这是封建史家和道士们玩弄的手法。

正是由于神权、上天、道士对于太宗的继位大有帮助，他才更加需要以神道设教，一来表示自己不忘旧恩，二来为了更好地安定人心。史载：“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寺灵感塔，以藏佛舍利。临瘞为之悲涕。兴国寺构二阁，高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观者无不骇愕。两阁之间，通飞楼为御道。丽景门内，创上清宫以尊道教。殿阁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时之盛。”^②对于道教，太宗更是偏爱，一些著名道士如丁少微、柴通玄、陈抟等人皆蒙太宗召见，

① 《续湘山野录》。

② 《儒林公议》。

尤其是陈抟，颇得太宗青睐，称其“独善其身，不干势力”^①，“宣至殿下，太宗与论治道，留之数日”^②，并“下诏，赐号希夷先生”^③。

太宗晚年，其皇位的传承又出现了问题。是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还是传给太祖的儿子，使他大费脑筋。传子，固其所愿，但又怕别人说他忘恩负义，辜负太祖传弟的一番心意；传侄，又心所不甘。此时，他再次想到了道教与道士。著名道士陈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史载：“帝（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指南衙见真宗，及门亟还。问其故，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建储之议遂定。”而对于这一点，随之上台的宋真宗是很清楚的。在西祀汾阴的时候，真宗曾到陈抟栖止的云台观，“谒其祠，加礼焉。帝知建储之有助也。”^④真宗朝道教热的兴起，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此也不无关系。

二、宋真宗大肆崇道

真宗时期是北宋道教崇奉的第一个热潮。

真宗朝道教热的出现，有着诸多的原因，但封建史家一般把其归因于王钦若对真宗的怂恿。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称：“真宗封岱祠汾，虽则继述先志，昭答灵飨，中外臣民，协谋同欲，实由文穆之力赞焉。”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对盟约十分满意，同时也对力促其亲征而达此后果的寇准十分敬重，认为他有“社稷之功”。这就使受到冷落的王钦若特别嫉恨。王钦若则对真宗讲，这种“城下之盟，《春秋》耻之”，^⑤如刷此耻，除用兵外“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方，夸示戎狄也”。所谓大功业“封禅是已”。而封禅所需的天瑞等稀世绝伦之事也可以人力为之。这就是上圣以神道设教之意。^⑥

① 《长编》卷 25，雍熙元年十月甲申。

② 《宣和遗事》前集。

③ 《宋史》卷 457，《陈抟传》。

④ 《邵氏闻见录》卷 7。

⑤ 《东都事略》卷 49，《王钦若传》。

⑥ 《长编》卷 67，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

此后，真宗又用珍珠买通当时的宰相王旦，使其不再持异议，从而为大兴道教做好了准备。因而王钦若的怂恿当是真宗大肆崇道的原因之一。

通过军事政变而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没有经过农民大起义的扫荡，一些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保存，前朝的种种弊政都被继承。朱熹曾讲：“古者劾薄之法，本朝皆备。”^①而地主阶级的势力也未受到大的打击。况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鼓励大臣多买良田美宅，进行土地兼并，加之宋王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的推行，使得北宋初期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太宗时期就爆发了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到真宗时期，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人民的反抗时有发生。在真宗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至道二年（996）十一月，同知当审官院、通进银台司封驳事田锡就上书指出：“臣见银台司诸道奏报，自九月初至冬至节前，申奏盗贼不少，今不一一具奏，虑烦圣聪，且据其可言者一二而言之：九月四日，群贼四百余人，惊劫人户；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贼四十余人过河北；十五日，卫州奏，有贼七十余人过河北；十九日，绛州奏，垣曲县贼八十余人杀县尉成柄；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贼一百五十三人，入白波兵马都监廨署，并劫十四家……濮州奏，盗入堙城县；单州奏，群盗人归恩指挥营；济州奏，群盗人金乡、钜野县郭十九家；永兴郡奏，虎翼军贼四十余人劫永兴南庄；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县贼一百余人，白高渡溃散军贼六十余人；七日，陕府奏，集津镇群贼六十余人，并惊劫人户；八日，西京奏，草贼见把截土豪镇，官私往来不得。岂有京师咫尺，而群盗如此，边防宁静，而叛卒如是”^②。在这里，田锡所指出的盗贼，仅是从九月初到冬至这段时间就京师附近“一二而言之”，远不是其全部。即便这样，已使人讶其之多，况实际远不止此，那么就全国范围来讲，盗贼之多，更是可想而知。《宋史》、《长编》多有记载，不再一一列举。

也就是说，在真宗统治的咸平（998—1003）、景德（1004—1007）年间，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农民起义处处蜂起。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为粉饰太

① 《朱子语类》卷110，《论兵篇》。

② 《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巳。

平，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转移人民的视线，以神道设教，使人民处于一种宗教崇拜的狂热衷。因此真宗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道教热出现的又一重要原因。

北宋前期，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就是对于真宗能否合法的继承皇位，是存在着争议的，这就涉及有关“金匱之盟”的问题。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称：“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先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耳。’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赵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自署名云：‘臣普书’，藏之金匱，命谨密宫人掌之。”^①而《长编》也记载：“始太祖传位于上（太宗），昭宪顾命也。或曰：昭宪与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廷美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皇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②当然，对于金匱之盟的真伪问题，在史学界存在着争议，前辈史家如邓广铭先生等人，认为金匱之盟是宋太宗和赵普伪造的一个盟约，而最近孔学撰文，指出金匱之盟的上述传承是确实存在的。^③然而，不管这个盟约是真也好假也好，都反映了在皇位继承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按照所谓的金匱之盟，太宗之后，应传位于廷美、德昭，而不能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此盟约不管真假，都等于给太宗的皇位继承套上了枷锁。宋太宗想改变这个盟约，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就向赵普请教。^④在得到了赵普的赞助之后，他就采取了行动，与当时的名道士陈抟合谋，演出了一场戏剧，从而扶植真宗登上了皇位，前已有述，不赘。

为了证明真宗继位的合法性，一些人还编造了真宗是道教大神转世的神话，据载：“杨砺，周显德中初应举，尝夜梦，见一人衣冠甚古，自称征君。谓砺曰：‘汝能从吾游乎？’砺随往，顷之，睹宫卫严邃。俄升大殿，见一南

① 《涑水纪闻》卷1，《金匱之盟》。

②④ 《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

③ 《“金匱之盟”真伪辨》，载《史学月刊》。

面而坐者。征君指之曰：‘此来和天尊，汝异日当事之。’砺再拜而退。及为记室，谒襄邸还，谓其子曰：‘今日见襄王，正昔日所见来和天尊也。’”^①又有李至阳，在他所作的《亢宫赋》序中称：“予少多疾，羸不胜衣。庚寅岁夕，忽梦游一道宫，金碧明焕，一巨殿，一宝床，岿然于中。一金龙蟠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光体天地。傍有道士，转眄若电，谓余曰：‘此亢宿之宫也，大象无停轮，宜速拜之。汝将事此龙，积疾亦消。’余将拜，龙辄先拜。”至道初年，“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命公与李沆相并为太子宾客。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轻待，吾选正人辅导汝，宗基国本，吾无虑矣。’真皇恭禀圣训，见必先拜，符亢宫之兆也。”^②来和天尊和亢宿皆道教天神，如此，真宗的继位就有了天命的支持。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被神权掩盖了起来。真宗大兴道教，一则表示在继位中对道士的帮助莫或敢忘，二则以此来应和自己是道教大神转世的说法，三则借天意神权消除自己在澶渊之盟前怕战惧敌的影响，进而消除人们对这个本不太合法继承皇位的帝王的失望。可见，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当是促成真宗朝道教热的又一重要原因。

真宗时期，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西北地区李继迁不断骚扰。咸平四年（1001）九月，李继迁陷清远军（今甘肃陇县西）。五年三月，陷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六月，进围麟州（今陕西神木）。^③咸平六年四月，继迁寇洪德砦。十二月，“西面部署言李继迁攻西凉，知府丁维清没焉”。^④继迁死后，继位的赵德明依违于宋辽之间，仍对宋王朝威胁很大。

北方地区，尽管宋辽之间订立了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奉送大量银绢，但这只能暂时满足契丹贵族的胃口，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觊觎之志和用武之心。订盟不久，辽就出兵讨伐阻卜和甘州回鹘^⑤，并在此后兴兵伐高丽^⑥。这种情况，宋真宗不得不引以为忧，而思有以制之。故利用契丹之习俗，大

① 《隆平集》卷9，《枢密》。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47。

③ 《宋史》卷6，《真宗纪》。

④ 《宋史》卷7，《真宗纪》2。

⑤ 《辽史》卷14，《圣宗纪》5。

⑥ 《辽史》卷15，《圣宗纪》6。

兴道教，以消除其南下野心。《宋史·真宗纪》称：“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鹄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觐之志欤？”由此可见，真宗时期所存在的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也是其大肆崇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宋真宗开始了大肆崇道。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书降左承天屋之南角，真宗率众十分恭敬地取下天书，“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缄，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辞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静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于金匮。”^①自是之后，天书屡降，各种祥瑞也纷至沓来。此时，宋真宗又杜撰了一位道教大神作为赵氏圣祖。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宋真宗告诉大臣，说他梦见了传降天书的神人，神言前降天书是赵宋王朝的祖先赵某传授的，并说这位祖先还要来见真宗，让赵宋王朝像唐朝恭奉太上老君一样恭奉这位始祖。接着，真宗详细描述了圣祖降临的情形：“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天尊）命朕前曰：‘吾……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此后，真宗又带领大臣到延恩殿，历观天尊降临之所，并布告天下，令丁谓、李宗谔、陈彭年与礼官一起修崇奉仪注。闰十月，又给这位圣祖上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给圣祖母上尊号为“元天大圣后”。^②

圣祖降临，既授天书，又予明示，崇道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于是祥瑞屡现，天书屡发，那么，真宗的封禅泰山也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为泰山封禅，他为自己找的第一个借口就是“昭答灵祝”，第二个借口是“继述先志”，即完成太宗雍熙年间因故未行的封禅。从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起，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僧道及百姓父老等屡次上书，请求封禅，真宗因而也就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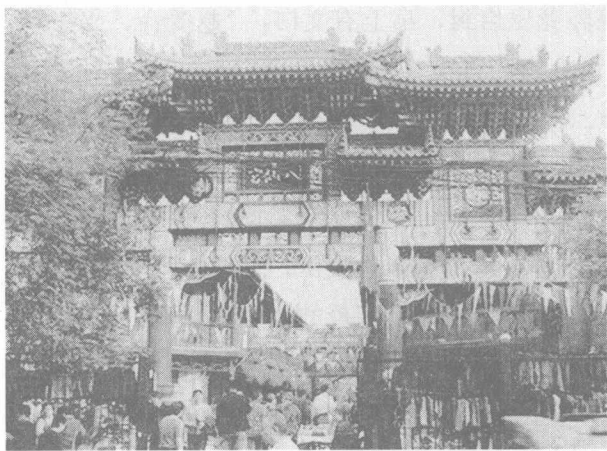
① 《长编》卷 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

② 《宋史》卷 104，《礼志》7。

民所请，答应在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东封泰山。^①

经过几个月的礼仪、发运及充役人员的准备，十月辛卯，正式出发去封泰山。其仪典之盛，不可胜言。这一活动持续至十一月丁丑，往返共四十七日，史载：“帝之巡祭也，往还四十七日，未尝遇雨雪。严冬之候，景气恬合，祥应纷委。”^②

大中祥符四年，真宗西祀汾阴，“备三献，奉天书于神之左，以太祖、太宗并配，悉如封禅之礼。”^③



八仙宫创建于宋

为了更好地发展道教，宋真宗开始大建宫观，普度道士，整理道教经典。

真宗时宫观的建设有两大特点，一是规模大，二是数量多。“大中祥符元年，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诏东京建玉清昭应宫，天下置天庆观。”^④就此材料，我们来

讨论此时宫观建立的两大特点。史载：

祥符中，议营昭应宫，计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谓总领其事，以夜继昼，每绘一料，给烛两条，逾七年而就。^⑤

大中祥符元年，增官名曰玉清昭应宫。凡役工日三、四万，发京东、西、河北、淮南州军禁军。调诸州工匠，每季代之；兵卒岁一代。并优其口粮、资值，选四厢指挥使忠佐二员董其役。……玉

①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

② 《宋史》卷104，《礼志》7。

③ 《长编》卷75，大中祥符四年二月。

④ 《新安志》卷3，《歙县沿革》。

⑤ 《国老谈苑》卷2。

清昭应宫，作于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十一月宫成。^①

（玉清昭应）宫凡三千六百一十楹。^②

据此可知玉清昭应宫规模之大、用工之多、所费之广。首先，建立玉清昭应宫，持续时间之长是少有其匹的。按原来估计，需时十五年，即便后来丁谓总其事，以夜继昼，日夜不停，还用了七年多的时间。其次，在七年的时间里，每天役工以最低限来计，一年用工一千零九十五万，七年用工近八千万。如每天役工以最高四万计，一年用工一千四百六十万，七年用工就达一亿零二百二十万。工匠要领工值、支付口粮，士兵要有军费负担，何况还有建宫的原料，其耗费不可谓不多。第三，玉清昭应宫共三千六百一十楹，占地面积极广，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宋人对此评论说：“作玉清昭应宫，耗费国帑不可胜纪”^③，致使祖宗以来的积蓄到此被一扫而空。当然，其中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也清楚地说明了修建玉清昭应宫的费用是巨大的，对北宋的财政也有一定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关于天庆观的兴建。对此，《长编》是这样记载的：“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愿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④ 此次建观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当时北宋政府的路、州、府、军、监、关、县究竟有多少。因此，这次建观的数量可以根据《宋史·地理志》作一推断。据载：“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县一十七……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县六十六。……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县一百九十八。……开宝四年，平广南，得州六十，县二百一十四。……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县一百八。……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另有军三、监一。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得州二、县十四。……钱入朝，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四年

① 《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② 《长编》卷108，天圣七年六月丁未。

③ 《东轩笔录》卷2。

④ 《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

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七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县八。”合计太祖、太宗两朝有州府三百二十六、军一、监一、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大中祥符年间，天下共有十五路（“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大中祥符介于至道和天圣之间，故为十五）并且，“宋有天下三百余年，由建隆初迄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无大增损。”^①所以上述统计数字，大体也是大中祥符年间的数量，这一数量，也应是大中祥符年间一次建天庆观的数量。合计路、州、府、军、监、县总数为一千五百八十四，所以大中祥符间一次建观就达一千五百八十四座。固然其中有不少是由原来的宫观改额而成，但其一次建宫观之数仍让人叹为观止。

真宗时期道教队伍的发展也极为迅速，天禧三年（1019）八月，一次就度“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②。到天禧五年，共有“道士万九千六百六人，女冠七百三十一人”^③。合计道士、女冠共二万零三百三十七人，超过了唐代的一万五千人。

在大修宫观，普度道士的同时，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真宗“选道士十人校订《道藏经》。明年，又于崇文院集官详校，钦若总领，铸印给之。”^④这次大规模的道经整理，前后经过了七年的时间，到大中祥符九年三月才告完成。旧《道藏》有“三千七百三十七卷，钦若增六百二十二卷。”^⑤成为一部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的巨著。

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时期，疯狂的道教热有所降温，但统治者对道教的崇奉并未停止。到徽宗时期，出现了道教崇奉的第二个热潮。

三、宋徽宗痴心佞道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徽宗继位，道教崇奉被推向一个新高潮。

徽宗的继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按当时封建继承法，他不是皇位的合

① 《宋史》卷85，《地理志》1。

② 《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23。

③ 《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13。

④ 《长编》卷86，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己酉。

⑤ 《成淳临安志》卷89，《纪遗》。

法继承人，从哲宗死后有关皇位继承的争论中，可以明确看到这点。作为当时执政大臣的曾布，亲眼目睹、参与了徽宗继位的活动，并作了以下记录：元符三年正月“己卯，至内东门……升殿，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宣谕云：‘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众未及对，章惇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余愕然未及对。太后云：‘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兼先皇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寿，尝答云，官家方偶不快，有甚事。’余既应声云：章惇并不曾与众等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允当。……议遂定。……端王至……皇太后坐帘下谕端王云：‘皇帝已弃天下，无子，端王当立。’王踧踖固辞云：‘申王居长，不敢当。’太后云：‘申王病眼，次当立，不须辞。’……升殿，上密谕章惇，语声低，同列皆不闻。余云：‘臣等皆未闻圣语。’惇云：‘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上亦回顾余等云：‘适再三告娘娘，乞同听政。’余云：‘……然长君无此故事，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上云：‘皇太后已许，适已谢了，乃敢指挥，兼遗制未降，可添人。’余等遂奉诏而已。召蔡京及呼梁从政取遗制重写讫，又呼从政等进入及指示所添一节，从政等色皆骇愕。”^①

从曾布的记载可见，按当时封建礼法，是不应立端王的。如按年龄的长幼，端王之上有申王；如按血缘的亲疏，端王之前有简王。所以当他登上皇位后，才“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而这种情况乃是幼君临政时的临时办法，对成年人君临天下的情况来讲，宋代无此先例，这一点曾布当时业已指出。从梁从政等听到遗制中添入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时“皆骇愕”的表现也可看出。这是端王继位后，心不自安，怕招致更多人的非议，以此堵人之口的办法。

通过上述记载，还可以看到，徽宗之立，必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打动皇太后，太后才力主立他为帝。但这种活动却不能公之于众。因此，要解释他之所以能登上帝王宝座，最好的借口就是上天、神圣的安排。宋太宗、真宗的所为，又为他树立了一个绝好的样板，同时也为他留下了一个行祖宗之意的借口。故而宋徽宗的继位就埋下了道教热重新萌生的种子。后来在一些道

^① 《曾公遗录》卷9。